

终于离开了唐家岭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邓锬在东莞落入传销组织，仍在北京的“发小”狄群立即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邓锬自述）后来狄群在北京报警，警方说这是工商局的事儿，不管。他又联系了我们在东莞的朋友。我借着“给家里报平安”的名义，给朋友打了电话，说“你放心，这周六我一定会见你”。但我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长期抗战，半个月到一个月出去。哪怕是死了，也比窝在这里面强。

没想到周六“主任”找到我，让我收拾东西走人，他怕我再悠悠几句，里面的人全都动了要走的心。

出来以后，我的想法是要考研，考云南物理研究所，学光学，就回到家里，吃吃喝喝中过了年。2008年2月份，又回到云南开始准备复习。这时候，一个朋友在玉溪开了家公司，叫我过去帮忙，做总经理助理，考研的事情便又放下了。

这期间，女朋友要来云南玩，公司给我批了三天假，我陪她去昆明、大理、丽江玩了二十多天。那段时间，我们又和好了，在分手四年之后。我和她约定，两年后我一定会去北京，在那里买房子。

2008年12月27日，把来云南旅游的妈妈和小姨送走以后，突然想和她过个元旦。匆匆忙忙收拾了所有的东西，12月30日，我坐火车再次来到北京，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一个人就把笨重的行李从火车站搬回房间。这一次来，我没有打算再离开。

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或者晚上和她一起吃个饭，就是这样，感觉还算好。一直在讨论工作的事情，因为在唐家岭，偶然的一次机会，陪朋友的女朋友去一家公司面试，经理说：既然来了，就一起聊聊吧！结果，我面试上了，朋友的女朋友没有。经理对我的评价是：有想法，不是看的书多想得

多，就是真的经历了太多！我想，是后者吧。

公司的待遇不算高，开始说是800，后来给我发了1200。接着就准备过年了，朋友都要回家，我却没有选择回家，是没脸回家。出来了两年，还依旧是一事无成。想好好学点东西，一个人静静地看看书。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唐家岭的出租房里，一个人对着电脑，两斤饺子，一瓶二锅头，心里有些空，外面的鞭炮声，每一声都炸痛了我的心！七天，我基本上没有出过门，没有和人说几句话。女朋友说她家里要来客人，不能陪我，让我一个人去庙会看看吧。可我一个人真的不想出去，不想说一句话。我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我要在北京买房子。我要实现我的承诺。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时常会吵架，有时候是天天吵，我知道是我做得不够好，我有一颗爱她的心，却在很多方面达不到她的要求。北京人和外地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那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得了神经衰弱，她交代的一些事，我会突然忘记，想不起她叮嘱我的那些话。可我知道，我对她的责任！四年前我的那次背叛，深深伤害了她！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我尽量小心翼翼地爱着她。

2月14日，情人节。从来没有过过情人节的我，这一天不知所措。买了一枝玫瑰花，买了一本书送给她，她说她没事的时候很无聊，就是看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我想看小说可以调节一下吧。尽管我更希望她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是我，就像我想着她一样。我等着她，等了四个小时，我没告诉她。我知道她有她的难处，没想到，她不喜欢玫瑰，也许是因为只有一枝

吧。我们又吵架了。

第二天，我们在电话里又大吵一架，我狠狠地摔掉了手机。我们分手了，就是这样分手了。

后来，我想挽回，可是她不接我的电话，不回我的消息。等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不管多久，我还是会等她。

爸爸打来电话说，姥姥病危了，暂时还没脱离危险；爸爸妈妈都下岗了。当爸爸问到我和她怎么样的时候，我真的想哭，我说：“我们挺好的！准备抽个时间回家去看你们呢。”爸爸说，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在北京好好干。电话挂断以后，我一个人走上天台，抽着烟，看着漆黑的天边，像我未知的未来一样。

我的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有段时间，我似乎得了抑郁症，每天都会失眠，会做一个梦，会梦见她，会想她。但是在我不能给她想要的一切之前，我不会打扰她的生活，我希望她是幸福的。我会一直在她身边，我愿意自己化成一顆行星，围绕着她，做她永远的守护神，就像五月天在《温柔》里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狄群和邓锬最初住在唐家岭北站附近的平房里。后来大片大片的楼拔地而起，他们便搬到了唐家岭主干道附近的楼房单间。

3月28日上午，两人最后一次来到狄群租住的房间，卷了被褥，将剩余的杂物整理带往邓锬那边。退房时，房东找借口扣下了狄群100元押金。

中午，还是狄群的女朋友回来亲手为他们做了红烧鸡块。狄群一边吃一边大赞：“好吃，真香！”他喜欢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平日里，都是他和邓锬一起做做饭。

他们买了锅碗瓢盆和电磁炉。再从菜市场买好菜，超市里买一点肉和几只鸡蛋。每天早上，邓锬会做好饭菜，够两人一顿早餐，还要再给狄群带一顿午餐。

午饭后，三人忙活起来，狄群收好最后几包衣服，把晒在屋顶的被褥抱回来，又忙着下楼叫车。来回三四趟，他们终于把大包小包运到车上。

坐进车里，关上车门，狄群才得空擦擦头上的汗水。车子启动，路边的行人、店铺、未完成的出租房缓缓倒退。狄群的女朋友不由得叹息：“终于离开唐家岭了，永远都不要回来。”

出了唐家岭村口的拱门，车子越开越快，两旁的杨树一棵棵从视野里闪过，那座熟悉的村庄终于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消失在车轮扬起的尘雾之中。

车子经过龙泽地铁站，邓锬摇下车窗，路边公交车站周围站满了等车的年轻人，公交车到站，他们蜂拥而上。邓锬笑了，这情景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唐家岭，不挤，就永远别想上车。

来到他们要搬入的小区，还算很新的单元楼与成排的绿树交替排列，没有唐家岭那么多的人，这里安静极了。狄群不禁惬意地说：“你看，以后在这楼下打打羽毛球，多爽！”

东西搬入新居，楼层依旧是三层。客厅、皮沙发、厨房、电视、洗衣机，还有随时可以洗热水澡的浴室，这些都是他们在唐家岭想都不敢想的。

收拾好属于他们的房间，邓锬坐在床上，狄群一屁股坐进沙发，闭上眼睛享受着期待已久的舒心。他伸出左臂，大手一挥：“终于离开唐家岭了！”

酝酿在70年代

畅销读物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说到电影跟怀旧，梁文道介绍了一本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的书。读完之后，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情吗？

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文革刚刚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最火热、最高潮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追溯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七十年代》。

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什么样的唱片、信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

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谈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稿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一个老人，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到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

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从这个挨批斗的老南洋华侨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上之大。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林彪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你去反思。

李陀跟北岛编的这本《七十年代》，有很多人的回忆。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厉、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正在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的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一时让人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居然还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他们的笑容竟然

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芒克低声说：“这回有戏了。”你看，这样一种描述，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反应。

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是他们同伙之间有一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两个“××”。

“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副泰然，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面的说法“哎呀，变天了，又变天了”。这就是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的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因为林彪叛逃。黄子平教授说到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上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聚集了2000人，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他是这样形容和回忆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70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90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的，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后来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更是让大家吃了一惊，甚至有人觉得里头写得还不错，有点道理，也有些奇怪。